

# 《史记·八书》校改理据研究

王华宝\*

〔摘要〕最新出版的《史记》中华书局修订本,共列出校勘记 3946 条,涉及改动文字的有 1250 条。其中“八书”部分 452 条,涉及改动文字的有 151 条,与点校本原有 140 余处改动相比,在数字上相差并不大,基本符合《修订凡例》规定的“修订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的原则。而具体情况则复杂得多,修订本“八书”部分新增 36 条改动,对点校本原改动之处作不同处理的也有 26 条。对两本异同情况的研究,特别是校改理据的研究,是《史记》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史记·八书》;修订本;改动;理据

2013 年 9 月,中华书局《史记》修订本的精装本面世,2014 年 8 月推出平装本。此次修订,据《修订前言》介绍:“修订本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兼顾不同印次的文本差异。校勘所用通校本、参校本涵盖宋元明清各个时期不同系统最具代表性的《史记》版本。”<sup>①</sup>修订本与点校本文字的异同研究,将成为《史记》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史记·八书》首开文化专史之先河,拓展了史书的范围,但二千多年来“对八书的专题研究仍是薄弱环节”<sup>②</sup>。本文试图从《史记·八书》修订的总体概况、两本异同的具体理据研究等角度,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肯定修订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提出一些商讨之处。藉此以见前人筚路蓝缕之功,知今人后出转精之力,并揭示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 一、《史记》修订的总体概况与《八书》校改

《史记》“八书”一体,《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唐代司马贞称“记国家大体”。“八书”大体可分为政治(礼、乐、律、封禅)、自然科学(历、天官)、经济(河渠、平准)三类,切实反映了自远古迄汉初的国家大事与文化史实。以今日研究眼光观照,“书”是司马迁所创设的重要史书体裁,后世史书“书志体”及“十通”、“会要”、“会典”等大批政书类典籍,或为承袭流变,或作纵横扩展,共同构成研究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文献宝库。而

\* 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11189。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史记》金陵书局本与点校本校勘研究”(13YJA770032)、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史记〉异文的类型特点与价值研究》(14YYA002)阶段性成果。

①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修订前言》第 10 页。

② 徐日辉:《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99 页。

历代对“八书”的专题研究则相对薄弱,据徐日辉先生等统计,“专题研究八书的文章,自宋代以来共96篇”<sup>①</sup>。虽说近十多年又增加了一些论著,扩大了研究的范围,考索《史记》八书的学术渊源以及太史公创立八书的文化背景,探讨《史记》为何只选择上述八项制度,为何不载后代史书所记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百官、舆服诸方面的制度,等等,但与《史记》研究论著达4000余部(篇)这一数字相对而言,仍然不很相称。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上,也呈现出“八书”部分的遗误数量不小,商榷补正的文章不少,对此笔者也曾有订补<sup>②</sup>,多为修订本吸收。

从点校本没有自己新的校勘记,而以张文虎《札记》做代替<sup>③</sup>,到修订本有近四千条校勘记,应当说修订本有了很大的变化,校勘记也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对阅读《史记》文本大有助益。例如《律书》正文:“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二]。太簇长七寸(七)[十]分二,角。夹钟长六寸(一)[七]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七)[十]分四,羽。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一)[二]。林钟长五寸(七)[十]分四,角。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南吕长四寸(七)[十]分八,征。”(点1249/9至12行,修1490/8至11行<sup>④</sup>)这一段文字,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引录钱大昕《史记考异》、王元启《史记正讹》等说,多有校正,而局本并未改字。点校本却据《札记》等做了8处改动,可以说出现了系统性错误,也造成了改动中最大的失误。修订本全部不改,校记[一三]说:“本篇所载律数,唐代司马贞《索隐》已疑其误,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蔡元《律吕新书》继起考辨,清代钱大昕《考异》、梁玉绳《志疑》、王元启《正讹》等多有考证,张文虎《札记》亦有申论,诸家考辨校改凡八处。黄树岩、戴念祖、罗琳《史记律书律数匡正——兼论先秦管律》指出:经过严格推算可以认定,《律书》所载不是弦律,而是管律,其资料基本无误,各家考辨误以为弦律而加以推算校勘,结论有误(《自然科学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并举《隋书·律历志》引文与今本《史记》大致相同等为证,结论是“今一仍其旧”。修订本的选择,可以说为此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做了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又如《封禅书》正文: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月)[日]。(点1379/3,修1658/6)张文虎《札记》:“《志疑》云《汉志》作‘时日’,是。”<sup>⑤</sup>点校本据改。修订本出校不改。时月、时日,在表时间上可以通用,又微有差别,时月指四时和月分,时日指时辰和日子。参上下文“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以时致礼”、“常以岁时祠以牛”,则“时月”或更合文义。那么,修订本出校不改的做法更为允当。

修订本在学术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将成为《史记》研究新的学术平台。对其文本的进一步校订也必然成为研究重点之一。校订文本,需要对近四千条校勘记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对涉及文字改动的部分进行重点研究。对涉及改动文字的1250条,与点校本出校改符号的近800处进行对比,全面系统地研究其异同,可以清楚地看出修订本对点校本的继承以及提高之处。笔者统计,“八书”部分修订本出校勘记452条,涉及改动文字的有151条,其中有26条对原点校本改动之处做了不同处理,新增加36条;此外,点校本的排印之误、不规范的改动等28处,在修订本的校勘记中无法体现,而在《史记》文本中有所体现。

关于“八书”部分的版本异文情况,笔者曾据王绍曾、杜泽逊、赵统等整理的张元济《史记校勘记》

①徐日辉:《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第2页。

②赵生群、王华宝:《〈史记·八书〉校读札记》,载马景仑、薛正兴主编《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75—385页;又见拙著《〈史记〉校勘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16—117页。拙著列入《史记》修订本“主要参考文献”。

③笔者认为张文虎《札记》有近九千条,而点校本仅有近八百处改动,且有很多改动与张文虎之说不同,不宜将张氏《札记》作为点校本校勘记的替代品。详参拙文《试论张文虎〈史记札记〉的文献价值》,载《史记论丛》(第八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年,第549—560页。

④因点校本有明显的校改符号,故引文以点校本1985年10月第2版第9次印刷本为主,参见修订本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本,同时括注两本的页、行,以便检核。下同。

⑤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3页。

做过统计<sup>①</sup>。该书有六个版本,即:“所用底本为南宋庆元间建安黄善夫刻三家注本,校本为乾隆间武英殿刻三家注本。前者简称‘宋’,后者简称‘殿’。参校本有清刘喜海旧藏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单索隐本、明王延喆刻三家注本、近人刘承干刻宋蜀大字本等,依次简称‘衲’、‘汲’、‘王’、‘刘’。”该书校勘记的总量为“原校勘记共出校四千九百余条,而批‘修’、‘补’、‘削’字者一千八百余条”,<sup>②</sup>杜泽逊从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中辑出《补遗》计 226 条,总计 5110 多条。“八书”部分共有 751 条(另《补遗》有 27 条),点校本与宋本同者 242 条,与殿本同者 459 条,其他情况仅 50 条。列表如下:

	礼书	乐书	律书	历书	天官书	封禅书	河渠书	平准书	小计
条数	44	141	33	36	251	125	48	73	751
与宋本同	12	43	4	9	104	31	16	23	242
与殿本同	26	90	23	21	135	86	30	44	459
其他	6	8	6	6	12	8	2	6	50
补遗	1	5		3	6	10	2		27

综上所述,第一,与张元济《史记校勘记》六种版本有 751 条版本异文、清张文虎《札记》有 1104 条札记相比(据中华书局 1977 年排印本统计),修订本据十多种版本校勘,只列出 452 条校勘记,表明还只是根据修订体例做了“有限”校改;第二,修订本校勘记的三分之二,不涉及文字改动,只列出异文,或有倾向性意见;第三,将点校本不规范的暗改底本变为明改,或改正点校本的排印之误;第四,涉及改动的有 151 条,与点校本原有 140 余处改动(不含暗改)相比,在数字上相差并不大;第五,除对原点校本的改动作进一步说明外,修订本有 26 条对原点校本改动之处做了不同处理,新增加的有 36 条。我们认为,这与《修订凡例》规定的“修订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原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校改,此次修订全部重新覆核,凡原点校本已经厘定改正者从之”原则是相符合的<sup>③</sup>,学术方面的提高也是明显的。

二、《八书》新增改动的理据研究

“八书”部分,修订本新增 36 条校勘记。这是修订本的亮点之一,也是学术界衡量《史记》修订情况的重要指标。新增部分多允当可信。如《平准书》《索隐》:乐产云:“诸所废兴,附上困下,皆自汤,故人不思之也。”(点 1434/14,修 1730/8)困,修订本校改为“罔”,校记[二八]说:“据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改。按:《汉书》卷六《武帝纪》:‘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附上罔下”为陈词,如汉刘向《说苑·臣术》即有:“《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作“罔”近是。然有的改动,还可以进一步商讨。兹举数例:

例一 《乐书》《集解》:“郑玄曰:‘逮,及也。事,伐事也。’”(点 1227/5,修 1456/13)按:伐事,修订本改为“戎事”,下文《正义》“伐事之机”亦改,校记[六九][七〇]同为:“‘戎’,原作‘伐’,据殿本改。按:《礼记·乐记》郑玄《注》作‘戎’。”修订本的改动似与张文虎“疑不能定”的想法差距较大,《札记》卷三说:“《记》《注》‘伐’作‘戎’,而《疏》中两云‘战事’,无‘戎’字,下文‘及时事也’注云‘时至武事当施也’。伐、戎、武字形皆相似,疑不能定,仍之。”因此,此类尽管有殿本作依据,但只能说明

①张元济:《史记校勘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②见《史记校勘记整理说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2 页。  
③见《修订凡例》第 3 页,《史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殿本有异文作“戎事”，处理的方式以出校不改为宜，修订本改字的做法值得商榷。

例二 《律书》《索隐》：“从子至未得八，下生林钟是也。又自未至寅亦得八，上生太簇。然上下相生，皆以此为率也。”（点 1251/13，修 1492/末）按：修订本在“从”字前补“孟康注云”四字，校记[一七]：“据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补。按：《通鉴》卷一二四《宋纪》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胡三省《注》引作‘孟康注曰’。”标点为：孟康注云“从子至未得八，下生林钟”是也。又“自未至寅亦得八，上生太簇。然上下相生，皆以此为率”也。今检《汉书·律历志》“八八为伍”师古注引孟康曰：“从子数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钟。数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为率。”<sup>①</sup>可知，本文与孟康原文出入近十字，按局本无“孟康注曰”来理解，则此文可以看作是司马贞据孟康注等所作的注解，于义亦通。此类情况出校说明版本有异文，是可行的，是否要补入原文，坐实为孟康的注，则似可讨论。

例三 《封禅书》《索隐》：此之“一云”，与《汉书·郊祀志》文同也。（点 1368/6，修 1645/12）按：修订本在“此之”前补“《注》‘一云之下上时’”七字，校记[二七]说“据《索隐》本补”。修订本补七字，意在说明《索隐》注释《集解》。然上文《集解》“之下上时”，修订本已校改为“之下时”，删去了“上”字，这就出现了修改后的《集解》与新补的《索隐》相差“上”字的新问题。由此可见，《索隐》本与三家注本，特别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局本，在文字取舍方面有一定差异，对其异文，宜审慎对待。

例四 《封禅书》《索隐》：“述亦未详，《汉书》作‘遂’。”（点 1375/15，修 1654/9）按：这是史文“诸述”的注释。“遂”，修订本径改为“逐”，无校勘记。查核底本金陵书局本作“逐”，又有张文虎《札记》云：“官本‘逐’，与《郊祀志》合。各本讹‘遂’。”可见，修订本依据版本、校记做改动，似乎具有较为充分的理据。然而《史记会注考证》卷 28 史文作“诸述”，《索隐》作“述亦未详，《汉书》作‘遂’”，《考证》说：“述，《汉志》作‘遂’。《周礼·稻人》注：遂，田首受水小沟。《考工记·匠人》注：遂者，夫间小沟。《地官》序官注：遂谓王国百里外。皆主道路言之。诸严、诸遂，谓路神耳。愚按：述、术通，亦道路之义。”此说显示“遂”、“逐”均有来源，点校本作“遂”字不一定为排印之误，也可能是有意的改动。修订本对点校本做改动，出校说明则更为稳妥。此外，《会注》本是修订本的参校本之一，“诸述”《会注》本作“诸述”，或可出一条异文校勘记。

例五 《封禅书》正文：“于（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菴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点 1375/8，修 1654/2 至 3）按：局本原文“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张文虎《札记》：“《志疑》云：‘《汉志》作杜亳有五社主之祠’，此误‘杜’为‘社’，《汉志》‘五’乃‘三’之讹。”点校本据改前一处“社”为“杜”。修订本两处并改为“杜”，校记[四六]说：“《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上作‘杜’，梁玉绳《志疑》卷一六以为作‘社’误。按：下‘社’字，景祐本作‘杜’不误，今并改正。”修订本于下文《索隐》“谓杜、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亦改为“杜主”（1655/3）。参下文《索隐》引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且据文列‘于’下皆是地邑，则杜是县。”可知《索隐》主要针对前一处来谈。“三社主”是否当改“三杜主”，似还需要论证。社主，指社稷之神。如《管子·侈靡》：“夫事左中国之人，观危国过君而弋其能者，岂不几于危社主哉！”可知“社主”本为常见词。本书下文“秦巫祠社主”，《索隐》：“社主，即文三社主也。”修订本出校记[五八][六一]两条，认为当作“杜主”，而未改字。这就又造成了有关联的又属同样情况，或改或不改，前后不统一的问题。

由上可知，新增的条目在异文的取舍与处理、校勘记的写法与关联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还需要精益求精，不断完善。

<sup>①</sup>《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966 页。

### 三、两本异同的具体理据研究

点校本与修订本大部分的改动是相同的,只有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存在各种不同之处。下面分为不同与相同两个方面来谈。

#### (一) 关于不同处理的问题

修订本尽管遵循了“以原点校本为基础”的原则,但还是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判断,“八书”部分对点校本原改动之处作不同处理的就有 26 条。总体上讲,态度较为谨慎,理据不够坚实时多采取出校不改的方式,对点校本的改动作不同处理的 26 条之中多为出校勘记而不改文字。以下分三类来谈。

第一类是点校本做了文字改动,而修订本改为出校勘记而不改文字。兹举三例:

例一 《律书》正文:“自含(血)[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点 1240/13,修 1480/末)按:张文虎《札记》卷三:“王氏惺斋《史记正讹》云当作‘齿’。”点校本据此改。修订本出校不改。

例二 《律书》《索隐》:又《律历志》云“阴阳相生自黄鍾始,黄鍾(生)[至]太簇,左旋八八为五”。(点 1251/13,修 1492/末)按:《札记》:“‘生’当作‘至’。”点校本据此改。修订本保留五字不变,校记[一六]:“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无‘黄鍾生太簇’五字,疑此有衍误。按:《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阴阳相生,自黄鍾始而左旋,八八为五。’亦无此五字。”

例三 《历书》《正义》:“黄鍾管,子时气应称正北,顺行四(时)仲,所至为正月一日,是岁之始,尽一章。”(点 1263/4,修 1508/11)按:顺行四时仲,《札记》云:“‘时’字衍。”点校本据此删。修订本出校不删。

以上三例,各代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修订本出校不改,更为稳妥。例一之中“含齿”,指口中有齿,代指人类。《列子·黄帝》:“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晋书·刘聪载记》:“且殿下高祖之世孙,主上之嫡统,凡在含齿,孰不系仰。”“含血”,指含有血液。可以泛指人或其他动物。汉王粲《大暑赋》:“根生苑而焦炙,岂含血而能当?”汉王符《潜夫论·边议》:“公刘仁德,广被行苇,况含血之人,已同类乎?”《后汉书·文苑传下·赵壹》:“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着之。”含血,义可通,可以不改。第二种情况是修订本出校不改,而又提出了其他意见,需要进一步论证。例二中说“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无‘黄鍾生太簇’五字,疑此有衍误”。可以说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笔者推测,张文虎所据本有“黄鍾生太簇”,张文虎认为“生”当作“至”。然三家注有注中夹注之例,疑“黄鍾生太簇”五字亦为后人所加夹注,如改为小字,则文从字顺。第三种情况是修订本的改动可能是点校本成果的遗失。例三中的“四仲”,中国农历节气术语,农历四季的各季中间一个月(即仲月)的总称。这里为天文学名词,代指十二辰的卯、酉、子、午。上文《索隐》有“冬季常居四仲”语,点校本删“时”字近是。或因无坚实的版本做依据证明“时”字是衍文,修订本恢复为“四时仲”。然此类对点校本的改动,修订本似宜有充足的理据,作出明确的学术判断,否则的话,点校本已取得的、学术界已沿用多年的成果可能造成遗失。最低限度的做法,在校勘记中说明点校本做了删字处理。

第二类是点校本做了文字改动,而修订本做了不同的文字改动。修订本对点校本改动之处所作的不同处理,总体上讲,更为稳妥,而部分条目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或提出更充分的理据。兹举两例:

例一 《天官书》正文:直为自立,立侯王;(指晕)[破军](若曰)杀将。(点 1331/2,修 1586/8)

按:《札记》:“旧刻‘指’作‘背’,疑‘指’字非。《汉志》作‘破军若曰杀将’,‘若曰’二字疑皆误。”整理本又案:“《正讹》云‘指晕’《汉志》作‘破军’,《史》本误也。‘若曰’二字衍。”中华本据改。”①金陵书局本作“指晕若曰杀将”,点校本改为“破军杀将”,修订本变为“破军若曰杀将”,与点校本产生差异。

例二 《天官书》正文:城郭门闾,闾臬(枯槁)槁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点 1339/11,修 1596/5)按:《札记》:“《考异》云:‘“枯槁”当作“槁枯”,与“闾”韵。“闾臬”《汉志》作“润息”,义长。’”点校本据之乙正。“槁枯”二字当加增校改符号,标为“闾臬(枯槁)[槁枯]”。否则,作“闾臬(枯槁)槁枯”,易使读者误以为金陵书局本衍“枯槁”二字,将文字倒乙当作衍二字。点校本未取后一说,修订本则二说并取,改为“润息槁枯”。

对于例一,修订本校勘记[九七]直接引王元启《正讹》卷三:“《汉志》作‘破军’,《史》本误也。”未涉及“若曰”二字。对点校本的改动情况特别是“若曰”二字,采取了回避方式,而正文则作了恢复。此处是存在争议的,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认为,点校本据王元启说改,有费解处,诸说皆有可疑处,“无法断言《史》、《汉》《书》《志》之旧究何若,姑从盖阙”②。对于例二,参考其校勘记可知修订本是据《汉志》与钱大昕《考异》之说改“闾臬”为“润息”。按照无版本依据一般不改字的校勘原则,此条没有版本依据,似以出校不改更为合理。

第三类是有一二处改动,与点校本处理不同,但未出校勘记,姑存疑。如《平准书》正文: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钱纵矣。(点 1434/5,修 1729/13)张文虎《札记》:“《杂志》云:‘杨可二字后人所加,《食货志》无。《索隐》至下文“杨可告缗徧天下”始云“杨姓可名”,则此处本无可知。’”点校本据删。修订本恢复了“杨可”二字,而无任何说明。究竟哪一种处理方式更为科学,需要有相关资料和严密论证,姑存疑待考。

## (二) 关于相同校改的问题

点校本与修订本改动相同的条目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八书”部分也大体如此。修订本“八书”校勘记涉及改动的有 151 条,点校本原有 140 余处改动(不含暗改),完全相同的改动达 104 条。相同改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修订本校勘记在张文虎《札记》的基础上增加材料,理据更为充分,提高了校改的可信度。如《乐书》《正义》:“既能穷本(知末)知变,又能著诚去伪,所以能述作,故谓之圣也。”(点 1191/10,修 1416/2)张文虎《札记》:“《疏》无‘知末’二字,疑衍。官本无。”点校本据此删“知末”二字。“知末”与“知变”义复,删之为是。修订本删二字,校勘记[三一]又补充“下文曰‘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亦其证”为说,是也。二是将点校本的暗改变为明改,并出校说明,计有 8 条。这种改动底本文字即作说明的做法,符合古籍整理规范。如《礼书》《正义》:“颍水源出洛州嵩高县东南三十五里阳干山。”(点 1166/3,修 1381/3)按:洛州,金陵书局本作“洛水”,而点校本径改为“洛州”。修订本校记[一〇]说“据本书卷四二《郑世家》‘颍谷之考叔’《正义》引《括地志》改”,将过去的暗改变为明改,并说明理由,可取。

还有一些技术性处理的问题。如点校本的校改为修订本所继承,而漏了校勘记。如《天官书》正文:“(食)[蚀]大角,主命者恶之;心,则为内贼乱也;列星,其宿地忧。”(点 1332/11,修 1588/5)按:《集解》:“徐广曰:‘一云“食于大角”’。”表明“蚀”“食”异文由来已久。张文虎未有论述,而《札记》标点本增:“《正讹》云此‘食’字亦当作‘蚀’,中华本据改。”③说明了是点校本改“食”为“蚀”。参考

①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礼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5页。

②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

③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礼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6页。

司马贞《索隐》：“谓月蚀列星二十八宿，当其分地有忧。忧谓兵及丧也。”点校本改字有所依据。修订本径作“蚀”字，无校勘记。然局本原作“食”，按照校勘体例，改字应当有说明，修订本似应补校勘记。

需要说明的是，两本校改相同并不一定就没有可商之处，因非本文探讨的重点，拟另文探讨，这里仅举两例。如《礼书》正文：孰知夫（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威也。（点 1162/4，修 1376/12）张文虎《札记》：“《杂志》云‘士’即‘出’字之误，《荀子》无。”点校本据此删“士”字。修订本出校，据王念孙说删字。管锡华先生《校勘学》“有合两本一正一误而衍者”举本文为例，由“出”之隶体误为“士”为说<sup>①</sup>。参考前人的考证、今人的致误之由等论述，“士”为“出”字之误，基本可信。而据本文《索隐》、《正义》均有“志士”字样，可知唐代司马贞、张守节所见之本已有“士”字。删“士”字则《索隐》、《正义》的注释无根。张文虎于《札记》中列出王念孙说而于金陵书局本中保留“士”字，较为可取。对此类情况，笔者以为无版本可作依据，出校说明之，不删字更妥。再如《礼书》正文：“是岂令不严，刑不陵哉？”（点 1165/1，修 1379/末）“陵”字，金陵书局本作“峻”，张文虎《札记》标点本案：“金陵本未及剜改，仍作‘峻’。”<sup>②</sup>点校本径改，无标记。《札记》出“刑不陵”条，并有“宋本、中统、游、毛、吴校金板并作‘陵’。《字类》引同。《说文》，陵，隋高也。它本作‘峻’，义稍别”一段，说明张文虎主张用“陵”，点校本据此改字，然未出校改符号，不符合古籍整理规范。修订本延用了“陵”字，文字与用作底本的局本“峻”字不同了，似应当出校说明。

总体来说，《史记》修订本在学术品质上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学术进步的必然，也得益于时代的进步。一方面，学术界肯定点校本、修订本分别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最高的古籍整理水平，各有其历史贡献和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史记》修订工作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复杂性，修订工作量之大、涉及面之广、困难度之高异乎寻常。本文列举“八书”部分新增改动与不同改动中存在的可商之处，涉及校勘原则、版本异文、校勘记的处理与古籍整理规范等不同方面，未敢自是，然可见《史记》修订之难，可知提升的空间，也表明经典的形成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责任编辑：陆 林）

## A Study on the Motivations for Revisions in *Shiji: Bashu*

WANG Hua-bao

**Abstract:** The latest revised version of *Shiji* 史记 (*Historical Records*)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has listed 3, 946 notes of collation in total, of which 1,250 notes are used to alter words. There are 452 notes in the part of *Bashu* 八书 (*Eight Treaties*), covering 151 notes for altering words. Compared with the revisions (over 140) in the punctuated edi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revisions, which is bas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requiring revised version to be based on the original punctuated one in *Revision Guide*.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a particular case, things will be more complex. The part of *Bashu* in the revised edition adds 36 changes. Besides, there are 26 alterations distinct from those in the punctuated edition. Th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especially on the motivations for such alteration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area of edition and textual studies of *Shiji* and othe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Shiji: Bashu*; revised edition; alterations; motivation

<sup>①</sup>管锡华：《校勘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

<sup>②</sup>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第280页。